

## 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

# 走进世界稻作文化起源地

康梦琦



上山遗址出土夹炭陶片中的稻壳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 万年前的稻作遗存

来到浦江上山考古遗址公园，一片金灿灿的稻田映入眼帘。田野中，“万年上山 世界稻源”8个大字格外醒目，这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题写。

建立在遗址原址上的上山遗址保护展示馆，由两座仿干栏式木构建筑组成，建筑面积1567平方米，分为1号馆和2号馆。走进1号馆，首先看到一大片裸露的遗址。不同深度的灰坑、灰沟里，站立着10余个根据考古队员形象制作的蜡像，生动还原了上山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上山遗址经过四期考古发掘，共揭露面积2000余平方米，出土1000多件文物。1号馆展示的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是1粒“万年稻米”。上山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讲述了这粒稻米背后的故事。

2000年秋冬之际，蒋乐平带领的考古队在浦江周边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位于黄宅镇渠南村北的上山遗址，遗址出土了一件比较完整的大口盆残器。此后，这种大口盆不断发现，并相继出土了许多石磨盘、石磨棒、石球和大量夹炭红衣陶片。在这些陶片的胎土中，考古队员发现了稻壳、稻茎和稻叶遗存。

蒋乐平曾从事河姆渡考古工作10余年。上山遗址的文化内涵，让他感到难以判定。“这种夹炭陶河姆渡也有，但大口盆从未见过，这个遗址可能不属于河姆渡文化。”

2002年，蒋乐平偶然得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可以对夹炭陶片进行碳14年代测定，于是托人将4片上山遗址的夹炭陶片送去北大检测。

2003年1月，北大吴小红老师电话告知蒋乐平：测年结果经过树轮校正，陶片距今约11400年到8600年。“听到这个结果，大家都震惊了。”蒋乐平说，“这样看来，陶片里的稻壳，也有上万年历史。”

郑云飞等植物考古学家选取了几件保存有清晰稻壳的夹炭陶片进行研究，对小穗轴、植物硅酸体遗存的分析表明，标本里有一部分为驯化稻。

之后，考古队员对上山遗址土层进行浮选，在早期文化地层中发现了数粒炭化稻米。“上山遗址早期文化地层中的炭化稻米，是目前通过系统浮选法在层位清晰的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稻米。”负责上山遗址植物浮选工作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说。

1号馆内展示了上山出土的部分夹炭陶片和烧土块。通过放大镜，可以清晰看到陶片和土块内的稻壳印痕。“上山先民把稻壳、稻叶碾碎后掺和到陶土中，一是为了减轻陶器重量，二是增加陶土黏性，防止陶器烧制过程中开裂。”蒋乐平说，上山稻谷中保留的小穗轴出现折断痕迹，不同于野生稻粒自然脱落的平整层，具有驯化和栽培的特征。

展厅里还有上山遗址出土的镰形器、石磨盘、石磨棒等石器工具。蒋乐平介绍，镰形器、石片石器等等器物的刃部有收割禾本科植物的微痕，并存在水稻植硅体，由此判断它们是水稻收割工具，而石磨盘和石磨棒可能是稻谷脱壳工具。“上山遗址出土陶片中近90%的夹炭陶片包含



上山遗址发现的3排柱洞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上山遗址保护展示馆外观

上山考古遗址公园供图

有大量碎稻壳，这是最原始的谷糠，证明稻米脱粒食用的状态。”蒋乐平说。

上山遗址发现了包括水稻收割、加工和食用的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存。“上山遗址的发现让稻作栽培历史上溯至1万年前，刷新了人们对世界农业起源的认识。上山文化不仅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世界文明也有着独特而重要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

### 远古中华第一村

上山考古遗址公园北区稻田边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远古中华第一村”。这是中国考古学泰斗、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严文明今年9月为上山所题。

“上山有两大文明表现，一是有栽培稻，二是开始建造木结构房屋。”蒋乐平指着上山遗址保护展示馆前的草坪说，这里曾发现长11米、宽6米、由3排柱洞构成的建筑基础，这种建筑形式跟河姆渡的干栏式建筑比较相似。“河姆渡建筑遗址由于长期被地下水浸没，与空气隔绝而保存较好，上山遗址的木质建筑早已腐烂，只留下柱洞。”

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以排柱式木构建筑为主要特征的居住遗迹在上山文化遗址中越来越多地被发现。此外，还发现了环壕、中心台地、墓葬等，具有早期聚落的特征。“这些遗址分布于钱塘江上游和灵江流域的河谷盆地，它们共同构成了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农业定居聚落。”蒋乐平说。

红日初升，浦阳江边，几个男子正在用石磨盘和石磨棒磨稻谷，其他人忙着狩猎、采摘，挖坑埋柱、建造房屋……上山遗址保护展示馆2号馆内通过投影的方式再现了上山人的生活。“大约在1万年前，先民们走出洞穴，来到平坦开阔的山前台地开始定居生活。”蒋乐平说，“这种定居特征在上山文化初期已经出现，标志着一个历史阶段的开端。浦江上山遗址因此被严文明先生称为‘远古中华第一村’。”

严文明曾说，浙江考古遗址的发现和命名很有意思，从美丽的小洲（良渚）出发，过一个渡口（河姆渡），跨一座桥（跨湖桥），又上了山

（上山）。这些遗址的发现轨迹，构成了一条通向远古文明的探索之路。

### 世界上最早的彩陶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共发现义乌桥头、仙居下汤、嵊州小黄山等19处上山文化遗址，堪称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规模最大、分布最密集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群。义乌桥头遗址距上山遗址约15公里，属上山文化中晚期遗址，因其丰富的考古成果，入围了“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审。

走进桥头遗址，首先看到钢结构大棚下约1600平方米的环境遗迹。以环境内沿为界，遗址中部围成一个略呈正方形的不完整台地。“这是目前国内发现年代最早、最完整的环境遗迹。”蒋乐平介绍，环壕-台地聚落遗址的出现，是村落形态复杂化的表现，也是定居生活更高级的证据。“目前发掘区东面还有遗址被村落覆盖，我们将继续探索发掘。”



义乌桥头遗址出土的彩陶片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遗址入口处有一座土坑竖穴墓，因埋藏较浅，人骨有所破坏。与其同期出土的另一具人骨保存较完整，现藏于义乌博物馆，从照片中看，其腹部放置着一件颜色鲜艳的红衣陶罐。这是一具身高1.73米的成年男性骨骸，经北大考古专家测定年代为距今8000多年，被称为“浙江第一人”。

沿着墓穴往前走，看到一个个探方，里面堆着大量陶器、陶片。桥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大口盆、平底盘等器型为主，陶衣鲜亮、工艺精美且数量众多，有的一个灰坑中就发现40多件，其中尤以彩陶最引人注目。目前，桥头遗址已复原陶器约150件。通过对彩陶所在地层内的炭化稻米、炭屑等进行碳14测年显示，其年代为距今9000年左右。

“过去认为黄河流域彩陶最发达，以甘肃大地湾为代表的彩陶文化，距今约有8000年历史。而近年在长江中下游桥头、湖西等遗址出土的彩陶，并不比黄河流域逊色。”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方向明说，上山文化彩陶是迄今发现世界上最早的彩陶，其施彩方式、纹饰图案独具特色。彩陶上出现了太阳纹、线圈纹，还有目前无法解释的神秘图案，值得进一步研究。

在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学术研讨会期间，“上山文化研究中心”“中华万年遗址联盟”挂牌成立，同时还举办了上山文化考古新成果展，展出了89件最新出土于桥头遗址和下汤遗址的陶器。蒋乐平说，上山文化考古新成果展接下来将在国内进行巡展，让远古稻作文明孕育的彩陶之花为更多人欣赏。

“玉匣聊开镜，轻灰暂拭尘。光如一片水，影照两边人。”在中国古代社会，铜镜是常见的日用器具，不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目前考古发现中国古代铜镜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一直延续使用至明清时期，几乎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历史。

中国国家博物馆近日举办的“镜里千秋——中国古代铜镜文化”展，从数以千计馆藏铜镜及相关文物中精选出260余件（套）展品，系统展示了中国古代铜镜的发展历史、制作工艺、贸易流通、铭文装饰、功用价值等，反映了中国古代铜冶铸技术的非凡成就和古人的审美意趣、民俗信仰。



清代《千秋绝艳图》(局部) 杜建坡摄

### 看铜镜里的千秋故事

本报记者 邹雅婷

走进展厅，首先看到墙上呈现了一幅古代美人揽镜自照的画面。展览的第一单元“鉴于止水”，讲述了“镜”与“鉴”的历史渊源。从齐家文化的重轮星芒纹铜镜、商代妇好墓出土的弦纹铜镜、战国时期的武士斗兽纹铜镜到汉代的四神羽人瑞兽纹铜镜、唐代的瑞兽葡萄纹铜镜、清代的婴戏纹铜镜等，各个时代铜镜的代表作品尽在眼前。除了常见的圆形铜镜外，还有方形镜、菱式镜、葵式镜、钟形镜等，多样的造型体现了古人的匠心巧思。铜镜的大小不一，既有小巧便携、带有手柄的“巴掌镜”，也有大如脸盆、纹饰华丽的镜中重器。“这种阔大厚重的铜镜价值不菲，是古代富贵人家才拥有的奢侈品。”“镜里千秋”展的展览助理赵玉亮对记者说。

西汉“中国大宁”瑞兽博局纹鎏金铜镜是此次展览的重点展品。这面铜镜出土于湖南长沙伍家岭，镜背鎏金，饰有博局T形纹、羽人、玄武、朱雀、瑞兽等丰富的纹样。镜缘铸有一圈铭文，共52个字，其中有“中国大宁”等吉祥语，表达了希望国家安宁、子孙昌盛的美好愿望。



西汉“中国大宁”瑞兽博局纹鎏金铜镜(局部) 杜建坡摄

铜镜是照面修容之工具，体现了古人对美的追求。古代工匠们创造出透雕镜、彩绘镜、螺钿镜、平脱镜等特种工艺，提高了铜镜的观赏价值和艺术价值。展厅里，一面唐代高士宴乐纹嵌螺钿铜镜吸引了不少人驻足欣赏。此镜镜背镶嵌螺钿片，刻画了人物、树木、鸟兽等。镜钮上方一株花树，树两侧各有一只振翅翘尾的鸚鵡。钮左侧端坐一人，手弹琵琶；右侧坐一人，手持酒盅，面前一鼎一壶，背后立一双手捧盒的侍女。钮下有仙鹤、水池，池内和池边有嬉戏的鸚鵡。此镜雕刻极为精细，人物和鸟兽栩栩如生，虽历经千年沧桑，依然令人人为其艺术魅力折服。

铜镜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赵玉亮介绍，随着公元前2世纪张骞凿空西域，大量的汉朝物产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亚、西亚等地区，其中包括铜镜这类日用品。三国两晋时期，随着佛教文化的传入，佛像开始与神仙图像共同出现在铜镜装饰中。以吴国工匠为代表的中国工匠东渡日本后，将当时流行的画像镜与神兽镜结合，制作出具有神兽镜特征的“仿制镜”。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包容并蓄的开放时代。一方面，外来文化汇入中华文明中，瑞兽葡萄纹铜镜就是吸收异域文化元素的典型物证。另一方面，遣唐使、商人等将唐朝的文明成果带到各地，精美的铜镜成为当地重要的收藏，丰富了世界文化面貌。在“清光宜远”单元，观众可以通过汉代“长宜子孙”连弧纹铜镜、三国变形四叶佛像对凤纹铜镜、“嘉兴元年”神兽铜镜、唐景龙三年瑞兽葡萄纹铜镜等展品感受中外文化交流的多彩。

此次展览运用动画、多媒体互动等手段丰富展陈形式，增强互动体验。在展厅里的触摸一体机上，可以360度欣赏“中国大宁”瑞兽博局纹鎏金铜镜等重点展品，清晰地看到铜镜上纹饰、铭文的细节。通过体验拼图互动游戏，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古代铜镜的结构。



唐代双鸾纹葵式铜镜

杜建坡摄